



城乡居民维权抗争方式比较研究

——基于五省份 2505 名成年居民的实证调查

彭国胜, 罗爱武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要:对五省份 2505 名成年居民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城乡居民权益受损的状况差异不大,却有着大相径庭的维权抗争焦点。城市居民的维权抗争主要集中在“失业保障”“企业改制”“城市拆迁”以及“房产纠纷”等方面,农村居民的维权抗争则主要围绕“土地征用”“宅基地分配”“基层选举”以及“债务纠纷”等方面展开。城乡居民在维权抗争方式上体现出明显的差异。在意向维权抗争方式上,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倾向于体制外抗争和体制边缘抗争,城市居民则比农村居民更倾向于体制内抗争。在实际维权抗争方式上,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表现出更多的体制外和体制边缘抗争行为以及更少的体制内抗争行为。

关键词:城乡居民;维权抗争焦点;维权抗争方式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15)02-0026-09

一、研究背景

体制化社会冲突的能力是衡量现代社会某种政治系统是否具有适应力的重要指标。一个具有适应力的政治系统允许其公民动用各种冲突应对机制,从而避免弗里德里克·巴洪所谓的“软弱的灵活性”或“原则性缺失”对政治稳定的冲击。^[1]

改革开放以来,在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急剧的社会变迁所引发的或激流汹涌或波澜不惊的各类社会冲突困扰着个体幸福与社会和谐,并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随着社会和谐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如何形成一种有效化解社会冲突的社会良性运行机制,无疑是当前的社会焦点问题之一。在此种背景下,对城乡居民的维权抗争方式展开深入的比较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

目前,国外关于中国民众体制内维权抗争方式的研究主要围绕法律模式和“笼罩着法律的影子”的非法律模式两条轴线展开。在法律模式研究上,一方面,正如黛蒙德等所指出的,法律已在中国民众应对冲突与表达不满等日常事务中扮演着前所未有的角色,尽管法律制度的缺陷众所周知,中国民众依然日益普遍地使用法律来追求自身权益;^[2]另一方面,中国法律体系固有的缺陷致使此种应对方式的成功变得困难,因为有效的诉讼往往需要各种权宜性策略的运用或政治联系等政治资源的动

收稿日期:2014-08-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的有效性评价研究”(12CZZ014);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自主招标课题“政治文化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政治参与问题研究”(JD2013071)

作者简介:彭国胜,男,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与民族政治学研究。E-mail:hnpgs7711@163.com。

罗爱武,男,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学研究。

员,这些策略或资源的获得需要公民获取媒体的支持或政府机构的同情,或者拥有接近要害部门的通道。^[3]在非法律模式研究上,国外学界对调解这一具有东亚特色的冲突应对方式表现出了较大的理论兴趣,且存在“文化决定论”和“结构差异论”的分歧。文化决定论认为,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国是全世界最倾向于使用调解来应对冲突的国家。^[4]结构差异论则指出,调解作为中国人最普遍的冲突应对方式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它与暴力、集体行动和胁迫性自杀等方式一样,只不过是众多冲突应对方式中的一种而已,且在地区、阶层等社会结构变量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5]

在国内,相关研究大多侧重于从底层视角出发,分析探讨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身临冲突情境中的各种抗争性应对行动,并形成了两种基本的理论框架,即以李连江和欧博文为代表的“依法抗争”框架和以于建嵘为代表的“以法抗争”框架。“依法抗争”即“以政策为依据的抗争”,其特点是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来对抗基层政府的土政策,此种反抗形式是一种公开的、准制度化或半制度化的形式。^[6]“以法抗争”则是一种“旨在宣示和确立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的政治性抗争。”^[7]此外,王洪伟提出了“以身抗争”的解释框架,即一种求助于内的“非政治性”“弱组织性”和“具体利益性”取向的抗争,^[8]从而进一步丰富了此领域研究的理论成果。

综观国内外相关研究,中国民众的维权抗争方式已得到了一定的学术关注,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从研究视角来看,相关研究大多属于对某种具体方式(如调解、信访、集体行为、诉讼)的个别探讨,鲜有对维权抗争方式的综合分析。在研究内容上,群体性维权抗争方式关注较多而个体化维权抗争方式关注过少。从研究逻辑来看,由于很少采用比较的逻辑,难以超越“过分的宽泛性与过分的特殊性”各自的弊端,从而限制了其理论解释的范围和普适性。因此,综合探讨城乡居民维权抗争方式的多元样态及其差异,尚有较大的学术开拓空间。

二、资料来源与样本状况

1. 资料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资料来源于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的有效性评价研究”的抽样问卷调查。此次调查的抽样范围为广东、湖南、湖北、贵州和云南五省的成年居民,所有样本均系随机抽样所得。抽样具体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采用多段抽样方法,先从广东、湖南、湖北、贵州和云南省的市(州、地)中按照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各抽取3个县(市、区),再从每个样本县(市、区)中,随机抽取4个街道办事处(或社区服务中心)和乡镇,再从每个街道(或社区)和乡镇中随机抽取50户居民家庭。第二步采用的是Kish户内抽样方法,从以上获得的城乡居民家庭中各随机抽取1名在家的成年人作为访问对象。如果碰到样本家庭户成员举家不在的情况,则根据就近原则随机替补,这样最终获得的实访对象即为此次问卷调查样本。

调查于2013年7月初正式开始,至8月底全部结束。参加调查的访问员主要是在校本科生,也包括部分研究生。此次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3000份,收回有效问卷2505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3.5%。其中,有效城市居民样本1461份,有效农村居民样本1044份。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资料即来源于此。

2. 调查样本的基本状况

本研究所获得的2505名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根据表1可见,性别方面,全体居民样本(0.49)和城市居民样本(0.46)中女性要稍微多于男性,但农村居民样本(0.54)中的男性要多于女性。从年龄来看,全体居民样本的平均年龄为43.34岁,其中城市居民样本的平均年龄43.61岁,农村居民样本的平均年龄为42.94岁。从民族身份来看,全体居民样本(0.92)和两个子样本均以汉族居民为主,其中农村居民样本(0.90)中的少数民族居民样本的比例要高于城市居民样本(0.94)。从文化程度来看,总体样本的平均文化程度(2.20)并不太高,集中于“初中”“高中(中专)”两个阶段之间,且偏向于“初中”一端。其中,城市居民样本(2.52)的平均文化程度依然处于“初中”“高中(中专)”两个阶段之间的位置,但要稍微偏向于“高中(中

专)”这一端;农村居民样本(1.73)的文化程度处在“小学及以下”“初中”两个阶段之间,且偏向于“初中”的位置。在婚姻状况上,总样本(0.92)和两个子样本均以已婚为主,其中城乡居民样本(0.91)已婚者的比例要低于农村居民样本(0.93)。政治面貌上,总体样本(0.10)和两个子样本中“非党员”占绝大多数,其中城市居民样本(0.11)中的党员比例要相对高于农村居民样本(0.08)。从宗教信仰来看,总体样本(0.87)和两个子样本均以无宗教信仰者居多,其中城市居民样本(0.87)中有宗教信仰者的比例要稍微低于农村居民样本(0.88)。家庭年纯收入方面,全体样本的均值为 26.61 千元,其中城市居民样本的均值为 36.01 千元,农村居民样本的均值为 14.25 千元,前者远高于后者。

表 1 调查样本的基本状况 (N=2505)

样本状况	全体居民		城市居民		农村居民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性别	0.49	0.50	0.46	0.50	0.54	0.50
年龄(周岁)	43.34	11.88	43.61	11.56	42.94	12.35
民族	0.92	0.27	0.94	0.24	0.90	0.30
教育程度	2.20	1.03	2.52	1.06	1.73	0.76
婚姻状况	0.92	0.27	0.91	0.28	0.93	0.26
政治面貌	0.10	0.30	0.11	0.31	0.08	0.27
宗教信仰	0.87	0.33	0.87	0.32	0.88	0.34
家庭年收入(千元)	26.61	214.96	36.01	279.10	14.25	65.49
阶层认同	2.24	1.08	2.43	1.02	1.94	1.10

注:年龄和家庭年纯收入由调查对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填写,其它各变量的赋值情况为:性别:1=男性,0=女性;民族:1=汉族,0=少数民族;教育程度: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或中专,4=大专,5=本科及以上;婚姻状况:1=已婚,0=未婚;政治面貌 1=中共党员,0=非党员;宗教信仰:1=无宗教信仰,0=有宗教信仰;阶层认同:1=下层,2=中下层,3=中层,4=中上层,5=上层。

三、结果与分析

1. 城乡居民维权抗争焦点之比较

根据表 2 可知,在被调查的 2505 名有效总体样本中,认为自己在过去的 5 到 10 年中没有遭受过不公平对待的共有 2214 人,占总体样本的 88.38%,亦即认为自己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的为 291 人,占总体样本的 11.62%。在 1461 名城市居民样本中,1303 人认为自己没有遭受过不公平对待,占城市居民样本的 89.19%,有 158 名城市居民认为自己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占城市居民样本的 10.81%。在 1044 名农村居民样本中,911 名认为自己未曾遭受不公平对待,占农村居民样本的 87.26%,尚有 133 人遭遇过不公平对待,占农村居民样本的 12.74%。卡方检验的结果显示,在遭受过不公平对待的总体状况上,城乡居民之间的差异不具有统计显著性($\chi^2=2.198$,sig=0.138)。

从表 2 还可以发现,城市居民的维权抗争焦点主要集中在“失业保障”(4.79%)、“企业改制”(4.04%)、“城市拆迁”(1.78%)和“房产纠纷”(1.71%)等方面,农村居民的冲突焦点则主要集中于“土地征用”(4.60%)、“宅基地分配”(2.30%)、“基层选举”(2.20%)和“债务纠纷”(2.11%)等方面。从卡方检验的结果来看,除了房产纠纷的差异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之外($\chi^2=0.025$,sig=0.874),其它方面的差异均表现出了相当高的显著性。由此可见,城乡居民虽然权益受损的总体状况差异不大,却有着大相径庭的维权抗争焦点。

表 2 城乡居民维权抗争的焦点

抗争焦点	全体居民 n(%)	城市居民 n(%)	农村居民 n(%)	χ^2 (sig)
房产纠纷	42(1.68)	25(1.71)	17(1.63)	0.025(0.874)
土地征用	65(2.59)	17(1.16)	48(4.60)	28.411(0.000)
城市拆迁	31(1.24)	26(1.78)	5(0.48)	8.428(0.004)
企业改制	65(2.59)	59(4.04)	6(0.57)	28.901(0.000)
失业保障	86(3.43)	70(4.79)	16(1.53)	19.503(0.000)
宅基地分配	35(1.40)	11(0.75)	24(2.30)	10.563(0.001)
基层选举	34(1.36)	11(0.75)	23(2.20)	9.564(0.002)
债务纠纷	37(1.48)	15(1.03)	22(2.11)	4.886(0.027)
其它	32(1.28)	12(0.82)	20(1.92)	5.782(0.016)
以上都没有	2214(88.38)	1303(89.19)	911(87.26)	2.198(0.138)

注:由于“在过去的一段时间(5~10年)中,您是否在以下各方面的事情中遭受过不公平对待”这一问题为复选题,故表中各频数之和大于总体。

从图 1 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到,在所考察的维权抗争焦点中,全体居民样本排在前三位的依次为“失业保障”“土地征用”和“企业改制”。从城市居民样本和农村居民样本的比较来看,城市居民在“失业保障”“企业改制”和“城市拆迁”等方面所发生的权益受损现象要多于农村居民,在“土地征用”“宅基地分配”“基层选举”和“债务纠纷”等方面所发生的权益受损现象则要少于农村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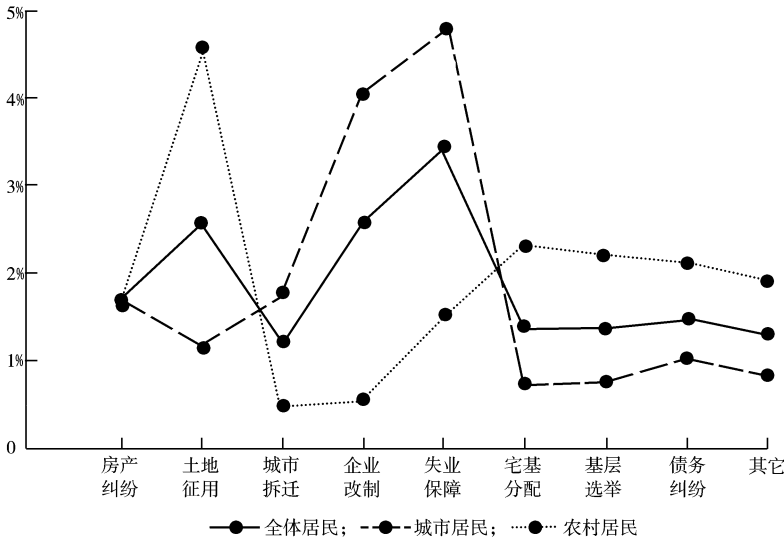


图 1 城乡居民维权抗争的焦点

2. 城乡居民维权抗争方式之比较

根据“抗争政治”研究专家蒂利的观点,抗争涉及的是提出对其他人之利益产生影响的要求。在最简单形式的抗争中出现的情形是:一方针对另一方提出自己的要求。抗争中的双方常常是个人,但其中的一方或另一方可能是一个群体或是一个机构。在这种最基本的维权抗争形式中,我们可以将一方视为主体(要求之提出者),另一方视为客体(要求之接受者),而所谓要求则总是包含着至少一个主体显而易见地对至少一个客体施加影响。要求的范围变化涵盖了从战战兢兢提出的请求到意欲发动攻击时的尖锐要求,不过,前提是这些要求一旦实现,便会以某种方式对客体的福祉及其利益产生影响。^[9]从这一定义出发,维权抗争方式乃是指明确感知到自身权益受损的冲突主体在冲突情境中提出对冲突客体的利益产生影响的要求的各种具体方式。

(1) 城乡居民意向维权抗争方式之比较

① 城乡居民意向维权抗争方式的简单描述与推论

本研究通过询问调查对象“如果您与政府机关(或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发生纠纷的时候,您是否赞同采取以下方式?”来了解其意向维权抗争方式,答案包括:“很不同意”“不太同意”“无所谓”“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分别计 1、2、3、4、5 分。

从表 3 可见,城乡居民所倾向于采取的方式依次为“自己直接上门讨说法,或通过亲戚、朋友或熟人施压”(3.28),“通过新闻媒体或网络曝光”(3.14),“到法院起诉或依法信访”(2.84),“忍气吞声”(2.51),“静坐、游行示威、集体(越级)上访”(2.47),“私下威胁、报复”(2.19)和“依靠自身强力”(2.07)。

均值检验的结果显示,城市居民在“通过新闻媒体或网络曝光”(F=9.369, sig=0.002)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农村居民,在“忍气吞声”(F=6.646, sig=0.010)上的得分显著低于农村居民,在“静坐、游行示威”(F=3.293, sig=0.070)和“通过亲戚、朋友或熟人施压”(F=2.823, sig=0.093)上的得分则略低于农村居民。

② 城乡居民意向维权抗争方式的因子分析

对上述 7 个意向维权抗争方式指标进行 Bartlett 球形检验和 KMO 度量,结果显示, Bartlett 球形检验值为 3109.455, KMO=0.716, sig=0.000,表明这些指标适合于因子分析。

表 3 城乡居民意向维权抗争方式及其差异的初始描述与推断 (N=2505)

测量指标	全体居民 M(SD)	城市居民 M(SD)	农村居民 M(SD)	城乡差异 F(sig)
静坐、游行示威、集体(越级)上访	2.47(1.04)	2.41(1.01)	2.52(1.07)	3.293(0.070)
私下威胁、报复	2.19(0.94)	2.15(0.92)	2.22(0.95)	1.724(0.189)
通过新闻媒体或网络曝光	3.14(1.15)	3.27(1.16)	3.07(1.13)	9.369(0.002)
到法院起诉或依法信访	2.84(1.10)	2.83(1.10)	2.84(1.09)	0.029(0.866)
自己直接上门讨说法,或通过亲戚、朋友、熟人协调或施压	3.28(1.05)	3.22(1.04)	3.32(1.06)	2.823(0.093)
依靠自身强力	2.07(0.94)	2.04(0.92)	2.08(0.96)	0.594(0.441)
忍气吞声	2.51(0.98)	2.43(0.97)	2.57(0.99)	6.646(0.010)

运用正交旋转的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得到三个公因子。第一个因子包括调查对象对“静坐、游行示威、集体(越级)上访”“私下威胁、报复”和“依靠自身强力”三个指标的赞同程度,可命名为“体制外抗争因子”;第二个因子包含调查对象对“通过新闻媒体或网络曝光”和“到法院起诉或依法信访”的同意程度,可以称其为“体制内抗争因子”;第三个因子为调查对象对“忍气吞声”和“自己直接上门讨说法,或通过亲戚、朋友或熟人施压”两个指标的赞同程度,可称之为“体制边缘抗争因子”。三个因子的 Cronbach 系数分别为 0.814、0.716 和 0.702,其组合信度为 0.763,其累计方差变异解释量为 74.305% (见表 4)。

表 4 城乡居民意向维权抗争方式因子分析 (N=2505)

测量指标	体制外抗争	体制内抗争	体制边缘抗争	共量
静坐、游行示威、集体(越级)上访	0.776	0.198	0.150	0.664
私下威胁、报复	0.885	0.176	0.069	0.819
通过新闻媒体或网络曝光	0.095	0.890	0.088	0.810
到法院起诉或依法信访	0.263	0.810	0.100	0.735
自己直接上门讨说法,或通过亲戚、朋友、熟人协调或施压	0.451	-0.033	0.686	0.675
依靠自身强力	0.807	0.111	0.105	0.674
忍气吞声	-0.020	0.201	0.885	0.824
特征值	3.004	1.174	1.024	5.202
平均方差	42.914 %	16.766%	14.625%	74.305%
因子 Cronbach	0.814	0.716	0.702	
Pc(组合信度)			0.763	
Bartlett			3109.455	
KMO			0.716	
sig			0.000	

③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意向维权抗争方式之比较

为了便于比较分析,将以上因子分析后所得到的各个初始因子值加以转换,使其变为范围在 1 至 100 之间的指数,①转换后的结果如表 5。

根据表 5 可知,城乡居民在意向维权抗争因子上的得分排序依次为体制边缘抗争因子(51.64)、体制内抗争因子(48.42)和体制外抗争因子(41.28)。

均值检验的结果显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体制外抗争因子、体制内抗争因子和体制边缘抗争因子上均呈现出显著的差异。

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倾向于体制外抗争和体制边缘抗争。从体制外抗争因子来看,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平均得分分别为 42.05 分和 39.98 分,前者比后者高 2.07 分,且这种差异具有一定的统计显著性 (F=4.074, sig=0.044)。从体制边缘抗争因子来看,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平均得分分别为 52.44 分和 50.28 分,前者比后者高 2.16 分,且这种差异呈现出较高的统计显著性 (F=6.216,

① 转换公式是:转换后的因子值=(因子值+ B)· A。其中,A=99/(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B=(1/A)-因子最小值。B 的公式亦为,B=[(因子最大值- 因子最小值)/99]-因子最小值。参见胡荣. 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J]. 社会学研究,2007(3):39-55.

sig=0.013)。

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倾向于体制内抗争。在体制内抗争因子上,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平均得分各自为 50.19 分和 47.38 分,前者比后者高出 2.81 分,且这种差异表现出了相当高的统计显著性($F=6.443$,sig=0.011)。

表 5 转换后城乡居民意向维权抗争方式因子得分之比较 (N=2505)

	体制外抗争		体制内抗争		体制边缘抗争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全体居民	41.28	18.55	48.42	20.09	51.64	15.71
城市居民	39.98	18.34	50.19	19.99	50.28	15.05
农村居民	42.05	18.65	47.38	20.09	52.44	16.04
F		4.074		6.443		6.216
sig		0.044		0.011		0.013

(2)城乡居民实际维权抗争方式之比较

①城乡居民实际维权抗争方式的简单描述与推论

在前述的 291 名遭遇过不公平对待的有效样本中,本研究通过继续询问其“是否采用过以下方式?”来了解其实际维权抗争方式。答案包括“是”和“否”,分别计 1 分和 0 分。在这一问题上,共有 288 名调查对象予以了有效的回答,其中城市居民样本 156 名,农村居民样本 132 名。

根据表 6 可见,在现实生活中遭受过不公平对待的时候,城乡居民实际采取的方式依次为“自己直接上门讨说法,或通过亲戚、朋友、熟人协调或施压”(0.44)，“到法院起诉或依法信访”(0.35)，“忍气吞声”(0.24)，“通过新闻媒体或网络曝光”(0.23)，“静坐、游行示威、集体(越级)上访”(0.08)，“依靠自身强力”(0.07)和“私下威胁、报复”(0.07)。

从均值检验的结果来看,城市居民在“通过新闻媒体或网络曝光”(F=6.024,sig=0.015)这一方式上的得分要显著高于农村居民,在“静坐、游行示威、集体(越级)上访”(F=2.939,sig=0.088)方式上的得分要略微低于农村居民。

此外,城市居民在“到法院起诉或到政府机关进行个人或家庭信访”上的得分要高于农村居民,在“私下威胁、报复”“自己直接上门讨说法,或通过亲戚、朋友、熟人协调或施压”“依靠自身强力”和“忍气吞声”等方式上的得分要低于农村居民,但单一指标上的此种差异没有通过统计检验。

表 6 城乡居民实际维权抗争方式及其差异的初始描述与推断 (N=288)

测量指标	全体居民 M(SD)	城市居民 M(SD)	农村居民 M(SD)	城乡差异 F(sig)
静坐、游行示威、集体(越级)上访	0.08(0.28)	0.06(0.23)	0.11(0.32)	2.939(0.088)
私下威胁、报复	0.07(0.25)	0.04(0.21)	0.09(0.29)	2.463(0.118)
通过新闻媒体或网络曝光	0.23(0.42)	0.29(0.45)	0.17(0.37)	6.024(0.015)
到法院起诉或到政府机关进行个人或家庭信访	0.35(0.48)	0.38(0.49)	0.30(0.46)	2.100(0.148)
自己直接上门讨说法,或通过亲戚、朋友、熟人协调或施压	0.44(0.50)	0.40(0.49)	0.48(0.50)	1.564(0.212)
依靠自身强力	0.07(0.26)	0.05(0.22)	0.10(0.30)	2.360(0.126)
忍气吞声	0.24(0.43)	0.22(0.41)	0.27(0.44)	0.871(0.351)

②城乡居民实际维权抗争方式的因子分析

同样,运用正交旋转的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得到“体制外抗争”“体制内抗争”和“体制边缘抗争”三个因子,三个因子的 Cronbach 系数分别为 0.736、0.693 和 0.725,其组合信度为 0.706,其累计方差变异解释量为 55.946%(见表 7)。

③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实际维权抗争方式之比较

为了对城乡居民的实际维权抗争方式进行直观的分析,将上述因子分析后所得到的各个初始因子值加以转换,使其变为范围在 1 至 100 之间的指数,转换后的结果如表 8 所示。

表 7 城乡居民实际维权抗争方式因子分析(N=288)

测量指标	体制外抗争	体制内抗争	体制边缘抗争	共量
静坐、游行示威、集体(越级)上访	0.733	0.021	0.054	0.540
私下威胁、报复	0.780	0.019	-0.162	0.635
通过新闻媒体或网络曝光	0.112	0.775	-0.078	0.620
到法院起诉或依法信访	-0.127	0.786	0.067	0.639
自己直接上门讨说法,或通过亲戚、朋友、熟人协调或施压	0.115	-0.069	0.643	0.432
依靠自身强力	0.516	-0.168	0.459	0.505
忍气吞声	0.234	-0.126	0.689	0.545
特征值	1.557	1.234	1.124	3.915
平均方差	22.250%	17.633%	16.063%	55.946%
因子 Cronbach	0.736	0.693	0.725	
Pe(组合信度)		0.706		
Bartlett		258.244		
KMO		0.678		
sig		0.000		

表 8 可以发现,城乡居民在实际维权抗争因子上的得分排序依次为体制边缘抗争因子(36.55)、体制内抗争因子(33.54)和体制外抗争因子(10.71)。这一结果表明,在权益受损的冲突情境中,城乡居民的意向维权抗争方式和实际维权抗争方式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如前所述,在意向维权抗争方式上,城乡居民得分的顺序也是依次为体制边缘抗争因子(51.64)、体制内抗争因子(48.42)和体制外抗争因子(41.28)。虽然三个因子得分上的排序依然不变,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实际维权抗争方式上,城乡居民的体制外抗争因子得分不到体制内抗争因子和体制边缘抗争因子的三分之一,而在意向维权抗争方式上,体制外抗争因子的分数虽然同样是最低的,但其与其它两个因子得分的差距却不太大,均达到了其它两个因子的 80% 以上。可见,城乡居民在意向维权抗争方式上具有较为强烈的激进色彩,而其在实际维权抗争方式上则要表现得相对保守得多。

对三个实际维权抗争因子进行均值检验,结果显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体制外抗争因子和体制内抗争因子上均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但其在体制边缘抗争因子上则仅仅存在着微弱的不同。

在利益受损的实际冲突情境中,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倾向于使用体制外抗争。从体制外抗争因子的得分情况来看,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平均得分分别为 12.67 分和 9.38 分,前者比后者高 3.29 分,此种差异呈现出相当高的统计显著性($F=17.573, sig=0.000$)。

在利益受损的现实冲突中,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倾向于体制内抗争。在体制内抗争因子的平均得分上,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各自为 34.47 分和 32.15 分,前者比后者平均要高出 2.32 分,而且这种差异表现出了一定的统计显著性($F=4.485, sig=0.034$)。

在实际的冲突中,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体制边缘抗争方式的选择上存在着微弱的差异。从体制边缘抗争因子的得分结果来看,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平均得分分别为 37.50 分和 35.90 分,前者比后者平均要高 1.60 分,且这种差异呈现出微弱的统计显著性($F=2.366, sig=0.097$)。

表 8 转换后城乡居民实际维权抗争方式因子得分之比较(N=288)

	体制外抗争		体制内抗争		体制边缘抗争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全体居民	10.71	11.21	33.54	15.51	36.55	18.34
城市居民	9.38	7.03	34.47	15.31	35.90	12.49
农村居民	12.67	15.26	32.15	15.72	37.50	15.60
F	17.573		4.485		2.366	
sig	0.000		0.034		0.097	

四、结论与讨论

1. 结论

在对广东、湖南、湖北、贵州和云南五省 2505 名成年居民抽样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我

32

们可以获得如下结论。

(1)当前城乡居民权益受损的状况差异不大,却有着大相径庭的维权抗争焦点。描述统计的结果显示,城市居民的维权抗争主要集中在“失业保障”“企业改制”“城市拆迁”和“房产纠纷”等方面,农村居民的维权抗争则主要围绕“土地征用”“宅基地分配”“基层选举”和“债务纠纷”等方面展开。

(2)城乡居民在意向维权抗争方式上体现出明显的差异。均值检验的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倾向于体制外抗争和体制边缘抗争,城市居民则比农村居民更倾向于体制内抗争。

(3)城乡居民在实际维权抗争方式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根据均值检验的结果,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表现出更多的体制外和体制边缘抗争行为以及更少的体制内抗争行为。

2. 讨论

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启动的市场化进程促进了经济的迅猛增长,实现了计划经济条件下所无法达致的效率,却未能真正做到兼顾公平。市场化进程中权力与资本“联姻”——政治精英通过经济精英的支持来维持绩效,经济精英则通过政治精英的庇护来谋求利益,导致市场化改革不足与过度现象并存。市场化改革在造就一个富庶中国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10]有学者估算,“中国10%的富人掌握了中国45%的财富,而10%的穷人仅仅掌握1.4%的财富。”^[11]中国已逐渐变成世界上贫富分化较为严重的国家。“不平等的极大增加,已加剧了社会分裂和阶级冲突”^[12]。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日益推进,原本存在的城乡之间的差距迅速被进一步拉大。城市在市场化与工业化程度、居民的教育水平、财富积累、中间阶层规模、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水平、利益表达的渠道等指标上,均要远远领先于农村。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带着对现代都市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向往,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普遍而持久的人口大流动成为中国社会的一道蔚为壮观的风景。在这场人类史上规模空前的人口流动潮中,催生了“农民工”这一日益庞大的新群体。据统计,当前全国民工的总数已达2.74亿人,其中外出民工1.68亿人。^[13]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表现出更高的体制外维权抗争意向和行为,这可能与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感受到更大的交叉压力有关。维权抗争方式的城乡差异可能部分起因于如下事实: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农村居民受他们的生活经验的影响,强烈支持高层政府所倡导的各种社会改革,并对此抱以较高的政策期待;但同时农村居民在现实生活中又比城市居民遭受到基层政府和市场更加不公平的对待,其所处环境,无异于一种交织着冲突信息和对立压力的环境,从而感受到更大的“垂直交叉压力”。加之社会结构的日趋开放和日益频繁的流动,农村居民的参照群体已不再像往昔一样限于自己所属的内群体,而是日益倾向于同城市居民这一外群体相比较,这就强化了其所感受到的“水平交叉压力”。相较而言,处于相对强势地位的城市居民则更少遭受到同样意义上的交叉压力,因为他们生活在“相对均质的政治环境中”^[14],而且拥有同属“现代”的生活方式。农村居民此种“交叉压力”的累积可能会破坏其公正观念和关于“应然”的共识。而“在保护弱小反对强暴方面,社会公正在过去一直比法律权力更重要。”^[15]根据马克思·舍勒的“权利比较命题”,群体的与宪政或“习俗”相应的法律地位及其公共效力同群体的实际权力关系之间的差异越大,怨恨的心理动力就会越聚越多。关键不在于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种,而在于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一种不仅是政治的、而且也是社会的、旨在均贫富的制度中,社会怨恨可能是最少的。在一种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下,社会怨恨可能也会很少。因而,忍无可忍、一触即发的怨恨必然蓄积在如下社会中:在这种社会中,随着实际权力、实际资产、实际修养出现极大差异,某种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其他权利(确切地说是受到社会承认的、形式上的社会平等权利)便会不胫而行。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人都有“权利”与别人相比,然而“事实上又不能相比”。这种社会结构必然会积聚强烈的社会怨恨。^[16]

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表现出更高的体制外维权抗争意向和行为,也可能与农村居民的组织化程度比城市居民相对更低有关。当前,城市社会比农村社会拥有发达得多的组织机构系统是不争的事实。城市居民中相当一部分分属于不同的企事业“单位”或组织,这些单位或组织不仅能够作为一种“组织资本”,以“庇护者”的身份为其成员提供各种有效的权益保障,而且本身也具备较强的吸纳和消化利益冲突的能力,而这种组织资本对于大多数的农村居民而言是缺失的,农村居民更多的是作为

一种“原子化的个体”而存在。根据社会冲突论中的“组织条件”命题,如果冲突的个体化程度越高,为冲突所投入的人格与情感能量越高以及卷入冲突的“原子化”个体也就越多,其释放怨恨和不满时所导致的紧张程度和激烈程度也就越高。反之,如果冲突的组织化程度越高,为释放怨恨和不满而消耗的情感能量以及卷入冲突的“原子化”个体也就越少,其释放怨恨和不满时所导致的紧张程度和激烈程度也就越低。^[17]

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表现出更高的体制外维权抗争意向和行为,还可能与农村社会比城市社会更加缺乏体制内抗争渠道有关。例如,当前农村地区的新闻传播媒介远不如城市发达,农村居民所接触和运用的主要是电视等官方媒体,对于网络、微博等新媒体的接触和使用远不及城市居民,而这些新媒体的舆论监督已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维权抗争方式。再如,农村地区正式律师的数量和执业范围都非常有限,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尤其是边远农村)简直就是一种“法律边疆地区”^[18]。

经市场化浪潮的洗礼,权利意识日益觉醒的农村居民在体制外抗争倾向和行为上高于城市居民,体现了其在享受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程度上的不平等。无论是因为经受更高的交叉压力,还是由于组织化程度偏低,抑或是因为体制内抗争渠道不足,其表达的无疑乃是对当前中国社会二元权利结构体系的一种不满和反抗,潜藏在此种不满和反抗背后的,乃是其作为一个整体的权利相对贫困和权利相对边缘化。城乡居民在维权抗争方式上的此种差异,值得社会管理部门和执政者高度关注和深思。

参考文献:

- [1] Yongshun Cai. Social Conflicts and Modes of Action in China[J]. *The China Journal*, 2008(59): 89-109.
- [2] Kevin J O'Brien, Lianjiang Li. Suing the Local Stat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n Rural China[J]. *The China Journal*, 2004(51): 53-74.
- [3] Neil Diamond, Stanley Lubman, Kevin O'Brien. *Law and Societ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M]//Neil Diamond, Stanley Lubman, Kevin O'Brien(eds). *Engaging the Law in China: State, Society, and Possibilities for Just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30.
- [4] Wall James, Michael Blum. Community medi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91(35): 3-20.
- [5] Neil J Diamant. Conflict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 China: Beyond Mediation-Centered Approaches[J].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00(44): 523-546.
- [6] 李连江, 欧博文. 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M]. 香港: 太平洋世纪研究所, 1997.
- [7] 于建嵘. 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J]. *社会学研究*, 2004(2): 49-55.
- [8] 王洪伟. 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以身抗争”的效度和限度分析[J]. *社会*, 2010(2): 215-234.
- [9] 查尔斯·蒂利, 西德尼·塔罗. 斗争的动力[M]. 李义中, 屈平,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 9.
- [10] 殷冬水. 中国民主前景海外研究述评[J]. *国外理论动态*, 2011(5).
- [11] Dickson J Bruce. The Party is Far From Over[J]. *Current History*, 2007(9): 243-245.
- [12] Yang Dali.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ts' Political Discontents in China: Authoritarianism, Unequal Growth, and the Dilemma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J]. *Annual Review*, 2006(9): 143-164.
- [13] 中研网. 全国外出农民工总数 1.68 亿[EB/OL]. <http://www.chinairn.com/news/20150228/164515713.shtml>.
- [14]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182.
- [15] 杨懋春. 一个中国村庄: 山东台头[M]. 张雄, 等,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167.
- [16] 马克斯·舍勒. 价值的颠覆[M]. 罗悌伦, 林克, 曹卫东,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7.
- [17] 乔纳森·特纳.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 邱泽奇, 等,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165.
- [18] 刘思达, 吴洪洪. 法律边疆地区的纠纷解决与职业系统[J]. *社会学研究*, 2010(1): 130-156.

(责任编辑: 李良木)